

蒙元时期的“守宫”与今日成吉思汗陵的渊源关系:兼论成吉思汗陵的性质

奇·斯钦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蒙古语言文字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 其四大斡耳朵仍被保留并由后妃们依次分别继承。元朝建立后, 为四大斡耳朵设置专门管理机构, 征收五户丝和江南户钞。元廷封宗王甘麻刺和他的子孙为晋王, 镇守漠北, 兼领四大斡耳朵, 史称“守宫”。以往的学术研究多有从制度的层面研究这一现象, 但没有触及到它的本质问题, 即用途问题。翻检《史集》和《元史》等史料, 不难看出保留是为了祭祀之用。2004年, 蒙日联合考古队对成吉思汗第一斡耳朵遗址的发掘, 进一步验证了这一事实。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把成吉思汗的葬地和祭祀地分作两处, 葬地由兀良哈人守护, 祭祀地即四斡耳朵由鄂尔多斯人守护, 直至元朝政权败退漠北。期间, 四大斡耳朵作为成吉思汗及其四位夫人的灵庙, 一直被保留在漠北原地。在四大斡耳朵基础上形成的明清两代的八白室及其今天的成吉思汗陵性质相同, 均为成吉思汗灵庙, 是蒙元时期遗留下的守宫制度的产物。

关键词: 蒙元时期; 守宫; 成吉思汗陵; 渊源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今日的成吉思汗陵是陵墓还是灵宫? 今日的达尔扈特人是守墓人还是守灵人? 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悬疑问题, 也是广大普通百姓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其实, 仔细研究蒙元时期的“守宫制”和新近的考古发掘不难找出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

一、蒙元时期的“守宫”

蒙元时期的“守宫”并非指一般的“留守宫内”或继承原有“宫分”之意, 而是指帝王死后, 其生前居住过的斡耳朵由后妃们依次继承, 负责掌管和祭祀的制度。成吉思汗去世之后, 其四大斡耳朵并没有荒废, 原有属民也没有离散。据《元史》记载, 成吉思汗四斡耳朵至元代末期, 仍旧保留在原地。《元史·文宗本纪》载, 至顺二年(1331年)二月丙寅, “以太祖四大行帐世留朔方不迁者, 其马驼孳畜多死损, 发钞万锭。命内史府市以给之。”^[1]说明一直到元代末期, 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仍旧保留在漠北原地, 并未迁徙他方, 如遇突发事件, 朝廷通过内史府予以解决。至顺二年八月甲寅, “斡儿朵思之地频年灾, 畜牧多死, 民户万七千一百六十, 命内史府给钞二万锭赈之。”^[2]陈德芝先生在其《赤那思之地小考》一文中说: “这是有关该地户口数目的惟一资料, 若按每户五、六口计, 该地区人口约有十万口上下。”^[2]这十万人口是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真正的守宫部落, 也是后来称之为“鄂尔多斯部”的直接祖先。那么, 被这些人留下来守护一百多年的成吉思汗四斡耳朵, 究竟留作何用? 学界一直没有展开深入研究。仅从《元史》等史书中的简单描写, 做一些浅显的探讨。例如《元史·后妃表》中记载: “然其居则有曰斡耳朵之分; 没, 复有继承守宫之法。”^[3]又云: “国制列圣宾天, 其帐不旷, 以后妃当次者世守之。”^[1]根据这些记录, 《中国通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 对蒙元“斡耳朵”的内在涵义做了一些相应的解释, 但没有触及到本质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斡耳朵”条目中记载: “成吉思汗有四大斡耳朵, 分别属于四个皇后, 帝、后死后, 大斡耳朵由幼子拖雷的家族继承。元朝建立后, 为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先后设置了四所总管府和一所都总管府, 下辖提举司、长官司和各种造作匠局等二十几个机构, 私属工匠、打捕

户遍布大都、上都、保定、东平、彰德、泰安、河间等地。这四大斡耳朵向腹里（中书省所辖的今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部分地区）九万人户征收五户丝；并向赣州路几万人户征收江南户钞。每年还从朝廷得到大批银两、罗绢缎绒等岁赐，敛聚和耗费巨额财富。元廷历封宗王甘麻刺和他的子孙为晋王，镇守漠北，兼领四大斡耳朵，称“守宫”。”[5]这种解释只回答了由谁来继承成吉思汗斡耳朵的财产和民户；由谁来管理成吉思汗斡耳朵；用什么来维持成吉思汗斡耳朵的日常开销等问题，最终还是没有回答它最核心的问题——用途问题。如果成吉思汗四斡耳朵或者后来的八白室离开祭祀这一功能，不可能绵延八百年。对于蒙古人，尤其是对于蒙古族统治者来说，保留成吉思汗精神遗产远比保留物质遗产重要的多。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业绩威震寰宇，在蒙古族群众心目中，他不只是一般历史人物或君主，而被视之为超圣超凡的天帝神人。蒙古历代君主认为成吉思汗生前是大汗天子，死后一定成圣为神，庇护众庶，福荫子孙。他们冀希皇族兴旺，江山永固，必须供奉有加，祀之唯谨。这就是保存并守护四斡耳朵的动因所在。只不过四斡耳朵地处“祖宗根本之地”，毗邻蒙元皇帝的“大禁地”而保密程度高，很少有人留下文字记载罢了。提出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或凭主观臆测，而有其坚实的史料基础和新今的考古学证据。

纵观蒙元已故皇帝斡耳朵，“守宫之法”不是特指太祖一朝，蒙元其它皇帝斡耳朵也有守宫的惯例。不过到了元代，其宫帐斡耳朵的保存形式和名称有所改变而已。元末成书的方志《析津志》“岁纪”篇中有这样的记载：“火室房子，即累朝老皇后传下宫分者，先起本位，下宫从行。国言火室者，谓如世祖皇帝以次俱乘袭皇后职位，奉宫祭管斡耳朵怯薛女孩儿，关请岁给不阙。此十一宫在东华门内向北，延春阁东偏是也。”[6]这与杨允孚的《滦京杂咏》中“先帝嫔妃火室房，前期乘旨达滦阳”的诗句相吻合。“火室房子”，即元代历朝后妃宫车。这些宫车属于诸先帝斡耳朵而先行，属官扈从。蒙古语所谓火室者，意思如同世祖皇帝一样，如果有皇后去世，健在的嫔妃依次承袭皇后职位，负责掌管和祭祀一个斡耳朵。她们的钱粮由官府发放，从不缺少。此十一室后妃斡耳朵或火室房子平日坐落在元大都宫城的东北角。从字面“累朝老皇后传下宫分”或“先帝嫔妃火室房”看，其斡耳朵好像属于后妃所有，其实从后面的“奉宫祭管斡耳朵怯薛女孩儿”（怯薛女孩儿，即健在的嫔妃及随从宫女——笔者）看，她们只不过是负责掌管和祭祀斡耳朵的人。她们所掌管和祭祀的斡耳朵无疑是已故皇帝斡耳朵。换言之，已故皇帝斡耳朵或“火室房子”的真正的主人并非后妃，而是由人成神的已故皇帝。祭祀斡耳朵从固定的宫帐到可移动迁徙的宫车是适应两都之间巡幸和祭祀的一种变革。“元君立，另设一账房，极金碧之盛。及崩及架阁起。新君立，复自作斡耳朵。”[7]元君居住宫阙，另建有宫帐斡耳朵，极尽金碧辉煌，皇帝去世后，将其架阁起，改造成车载宫帐，由后妃们相继守护，巡幸于两都之间。这种皇帝驾崩之后“架阁起”的斡耳朵便是可移动的“火室房子”。汉儒林主编《元朝史》中对这种斡耳朵的职能论述如下：“可以设想，每位皇帝死后，在世皇后率“怯薛女孩儿”奉守原斡耳朵，其职能主要有二，一为按本俗（烧饭礼）至烧饭院进行祭祀，二是奉宫车巡幸上都。”[8]元朝皇室按本俗祭祖的日期有二，一是在上都于七月七日或九日举行的奠马酒，望祭“北方陵园”的仪式，二是于“九月内及十二月十六日后”在元大都烧饭院举行的烧饭礼。把固定斡耳朵改造成宫车很可能是适应这种一年二祀的实际需求。故此，所谓“火室房子”，就是由后妃们相继守护并负责祭祀的已故皇帝灵宫。《析津志》“古迹”条载：（烧饭园）在蓬莱坊南。由东门又转西即南园红门，各有所主祭之，树坛位。其园内无殿宇。惟松柏成行，数十株森荫，宛然君高凄恰之意。阑与墙西有烧饭红门者，乃十一室之神门，来往烧饭之所由，无人敢行。往有军人把守。每祭，则自内庭骑从酒物，呵从携持祭物于内。烧饭师婆以国语祝祈，遍洒湮酪酒物。以火烧所祭之肉，而祝语甚详。”[6]这里的“十一室之神门”与上述“十一宫”在数目上的对应当然不是巧合。至此我们已无可怀疑，“十一室之神门”或“十一宫”正是元朝已故十一位皇帝的灵宫，具体指哪十四位皇帝不得而知。

元朝统治者非常重视祭祖之礼。《元史·祭祀志》记载：“益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孝，孝莫大于祭。”[9]在元代，大都有太庙祭祀、神御殿祭祀和烧饭院祭祀，在元上都还有望祭“北方陵园”的场所。另外，还有晋王统领的漠北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巡幸于两都之间的，由“怯薛女孩儿”“奉宫祭管”的“火室房子”，可谓“其礼贵诚而尚质”。元代中原地区的皇帝灵宫与成吉思汗

四大斡耳朵相比，有了以下改变：第一、成吉思汗四斡耳朵，通元一代固定在一处，元朝已故皇帝斡耳朵以车载宫帐形式与在任皇帝一起巡幸于两都之间；第二、成吉思汗的灵宫仍称“斡耳朵”，元朝已故皇帝灵宫称作“火室房子”；第三、成吉思汗灵宫为“一帝数宫”（包括四位夫人灵宫），元朝已故皇帝灵宫变为“一帝一宫”。尽管形式和名称有所改变，但其性质和职能没有变，均为祭祀之用的灵宫。总之，守宫制度是贯穿整个蒙元时期的一种制度，准确地说是一种守灵制度。

二、成吉思汗灵庙的发现

上世纪，外国考古队一批接一批地根据《史集》和《元史》所提供的线索，在蒙古国境内寻找成吉思汗陵墓，但都无功而返。虽然探寻成吉思汗墓地的努力一次又一次以失败告终，但无意中也有收获，那就是发现了成吉思汗灵庙遗址。上世纪60年代，蒙古和东德的考古学者在肯特省德勒格尔罕县境内，对阿乌拉嘎（“A' uruq”——老小营）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成吉思汗第一斡耳朵所在。2001年和2004年，蒙古和日本的一支考古队，对该遗址重新挖掘，发现了带有明显的祭祀性质的建筑遗存，并初步确定该建筑为成吉思汗灵庙遗址。

2004年10月6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一支分别来自日本和蒙古的联合考古队日前宣布：他们找到了可能打开成吉思汗陵墓之谜的“钥匙”——成吉思汗的“灵庙”！如果“灵庙”身份得到确证，那么将会在灵庙方圆12公里的范围内锁定成吉思汗的陵墓。该报道称10月4日，日蒙联合考古队在位于距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市约150英里（大约260公里）的阿夫拉加市达尔根哈安（阿乌拉嘎市达尔罕汗——笔者）村附近，发现一座建在四角形基座上的13到15世纪的灵庙遗址。在灵庙的下方是一座几乎已成废墟的石头平台，在石头平台的下方藏有许多坑洞，里面埋葬着许多战马的骨灰和遗骨。从战马遗骸的数目之众来看，这座陵墓的主人显然地位非同寻常。在25米方形的基坛上约11米见方的范围内还发现了作为灵庙遗存的基石和柱穴，因为没有发现瓦和砖，所以推测上面所建应该是帐篷。考古学家们认为，在灵庙内，还发现从上面看为“凸”形的、高约40厘米的石壁，上面有烧火的痕迹。基坛的周围发现了埋灰和马骨的坑，调查团认为这是为祭祀成吉思汗而烧马等“烧饭”仪式的证据，这与中国史书的记载一致！另外，在灵庙的南侧，出土了刻有作为皇帝象征的龙的纹样的香炉，这则与14世纪波斯史书的记载相一致。^[10]

参与发掘的日方负责人——日本新潟大学教授白石典之在《成吉思汗庙的源流》一文中，对阿乌拉嘎遗址进行了科学界定。他结合2004年，对此处遗址宫殿基址、街道房屋等遗迹的调查发掘情况，认为阿乌拉嘎遗址中央的宫殿基址有三个不同年代层次的堆积，通过地层分析和年代测定（放射性碳素测定），得知三层基址的年代分别与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时期一致。根据地层及出土物的分析，白石教授认为，三个层次依次应该是成吉思汗宫殿旧址、窝阔台在此基础上改建的新宫殿遗址，以及最上面的蒙元时期祭祀性质的灵庙遗址。在此基础上，白石典之先生作出结论说：最初的成吉思汗庙是成吉思汗的皇宫（大斡耳朵），是由成吉思汗建造，经由窝阔台改建的祭祀宫帐。它是现存于内蒙古的成吉思汗灵庙（指成吉思汗陵——笔者）的原始形态。^[11]这一考古发现，从源头上解决了成吉思汗四斡耳朵（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保留至元末的四大斡耳朵）以及后来的演变体八白室的用途问题和性质问题。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他的继承者们把成吉思汗的葬地和祭祀地分作两处，葬地由兀良哈人守护，灵庙由鄂尔多斯人守护。

成吉思汗第一斡耳朵演变为灵庙一事，在14世纪的波斯文史书和汉文史书中也得到印证。《史集·铁穆耳合罕（元成宗）纪》说：“他把父亲遗留下的一整份财产授予了自己的长兄甘麻刺，把他派到了境内有成吉思汗的禹儿惕和斡耳朵的哈刺和林去，并让该地区的军队受他节制。哈刺和林、赤那思、昔宝赤、斡难、怯绿连、谦谦州、薛灵哥、海押立以迄于迓儿吉思边境的诸地区和名为不儿罕一合勒敦的成吉思汗的伟大禁地，全由他管，并由他守卫着照旧在那里的成吉思汗的诸大斡耳朵。它们在那里共九个：四个大斡耳朵和[另外]五个[斡耳朵]。谁也不许到那里，因为附近有禁地。他制成了他们[已故祖先们]的像；那里经常都在焚香[致祭]。甘麻刺也在那里为自己建了一座寺庙。”^[12]可见，晋王除了镇守漠北，统领四斡耳朵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使命是负责祭祀成吉思汗。《元史》中出现的晋王官邸——“晋邸”在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从后来明清两代济农（晋王的异音）

的职责来看，历代晋王很可能还承担着成吉思汗祭祀的主祭官的角色。如果说《史集》中看不出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与成吉思汗祭祀有什么联系的话，《元史·宪宗本纪》中有一则记载，却非常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夏六月，谒太祖行宫，祭旗鼓，复会怯鲁连（克鲁伦）之地，还幸月儿灭怯土。秋，驻蹕于军脑儿，酹马乳祭天。九月出师南征。”^[13]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把这条记载，忽略不计，重视不够。其实，这里的“谒”，应当理解为“祭拜”。古代蒙古人在出征前，举行一系列军礼活动，其中包括祭天、告庙、禡牙等出征仪式。这些活动具有“报告上天”、“恭行天罚”、“受命于祖先”等象征意义。蒙哥汗于1258年攻打南宋前，前往克鲁伦河复会诸王军将，“谒太祖行宫”、“祭旗鼓”，又在军脑儿举行“酹马乳祭天”等活动是这种军礼仪式的生动体现。这是太祖行宫演变为灵庙的文字证据。

古代蒙古贵族有焚烧马骨祭奠祖先的习俗。今日成吉思汗陵春季大宴的前一天晚上举行的“嘎如利祭祀”上，宰杀骡马、焚烧马骨的祭灵仪式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宰杀牝马是对祖先的一种馈赠，寓意在另一个世界的祖先神灵依旧能够拥有坐骑和享用马乳。叶子奇《草木子》记：“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其大祭则烧马。”^[14]普兰·卡尔宾的游记中也记载：“为了安宁死者的灵魂，他们用火将宰食的马骨烧掉。”^[15]阿乌拉嘎遗址中发现的众多马骨和骨灰（有三百多具马骨，以肋骨为主）正是这种祭祖行为的最好佐证。可以说，阿乌拉嘎遗址的发掘与上述记载互为参证，为成吉思汗第一斡耳朵的变迁提供了实物证据和资料支撑。

三、今日成吉思汗陵的性质

成吉思汗陵这一称谓始于清朝《钦定理藩院则例》。《钦定理藩院则例》记：“伊克昭盟境内有青吉思汗园寝，鄂尔多斯七旗，向设有看守园寝，承办祭祀之达尔哈特五百户。”^[16]清代张穆著《蒙古游牧记》说：“成吉思汗陵寝在河套外腾格泊西北，赛音诺颜左翼右旗与鄂尔多斯右翼中旗之交。”^[17]从此，位于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祭祀之地就有了“成吉思汗陵”的称呼。上世纪初，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和《蒙兀儿史记》作者屠寄二人，围绕所谓“成吉思汗陵”是否陵寝这一话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激烈辩论。时至今日，也有人持成吉思汗祭祀宫帐应当是陵寝，抑或是衣冠冢的观点。这种理解与误读蒙古语的“伊金霍洛”一词有一定的关联。“伊金霍洛”由“伊金”（主人、君主）和“霍洛”（院子、院落）两个词组成，意即“圣主的院落”。清代中晚期，因种种原因八白室由集中而分散，在原址只留下成吉思汗和正妻孛儿帖夫人的宫帐。其结构为两项相连（前后）的毡帐，外有木质栅栏围成的院墙。故此，便有了“伊金霍洛”的称谓。其实，“圣主的院落”并不等同于“圣主的陵寝”。除此之外，也与达尔扈特人故弄玄虚、感情用事的说法有关。张相文的《成吉思汗陵寝之发见》一文的相关论据，就是来自于达尔扈特人的这种口述材料。明清两代的蒙文史书中，把成吉思汗的祭祀宫帐或称为“成吉思汗八白室”或称为“圣主八白室”或“圣主白室”，从不以“成吉思汗陵”等加以命名。那么，今日的成吉思汗陵，以往的八白室中供奉的代表成吉思汗亡灵的物品为何物？这是揭开这一秘密的关键所在。是不是张相文先生所听到的那样“两幕相接，前幕供牺牲，后幕隔以锦帐，中供石匣，成吉思汗之遗骸”吗？两幕相接，后幕供有一口箱子或匣子是不假。但后幕中供奉的不是石匣，而是存放成吉思汗神像之镶银箱子。19、20世纪，西方的不少旅行家和探险者前后参拜过伊金霍洛。其中受沙皇委派专程前来鄂尔多斯的布里亚特学者扎姆查拉诺是唯一一位举行过个人祭拜仪式并全程目睹春季大宴的外国人。1910年春季大宴前的某一天，他经过有人占卜，征得达尔扈特首领同意，进入两项相连的蒙古包祭拜成吉思汗时，所见到的、面向磕头的圣物是一口镶银箱子：充楚（Čomčoγ-没有天窗的蒙古包）的上手位置的台架上安放着一口镶银箱子，这口箱子经常上锁……箱子前面较矮的供桌上摆放着正在燃烧的神灯、碗和盘子等器具。^[18]因为敬畏、安全、保密等原因，这口箱子从不向外人打开，钥匙由达尔扈特太师保管。那么，这口箱子里封存的圣物为何物？时至今日，秘密能否揭晓，疑案能否冰释，清朝蒙文档案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清代有五百户达尔扈特人每年每户交付一两白银，用于修葺八白室，维持四季祭祀费用的惯例（一般352.1两用于四季祭祀费用，147.9两用于修缮费用）。作为主祭官的济农每年制作一份五百两白银的支出薄记账，呈报理藩院审核。这些财务报表中称此箱子为“存放成吉思汗神像之包银箱子”或“存放并安奉成吉思汗神像之箱子”。顾名思义，里面收藏的主要物品为成吉思汗神像。乾隆三十

三年十二月初一日的一份蒙文档案记：“剩余一百四十七两九钱，用一百两翻新存放成吉思汗神像之包银箱子。”[19]还有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十八日的一份蒙文档案又载：“剩余一百四十七两九钱，今年用一百二十五两翻新存放并安奉成吉思汗神像之箱子，用二十二两九钱支付工匠工钱，共支出一百四十七两九钱”云云。[20]据清朝蒙文档案，这口箱子每十年翻新一次，翻新费用在八白室单项翻新费中最高。可见，该箱子在八白室中的分量与贵重。五世达赖喇嘛于1652年，应邀赴京觐见顺治皇帝。第二年返回藏地途中，又经过鄂尔多斯，受邀下榻在额璘臣郡王宫殿（当时的成吉思汗八白室在今天的达拉特旗王爱召附近的叫做‘敖兰布拉克’的地方，郡王宫殿在八白室附近——笔者）。他在自传中说：“在济农王的殿堂里，有一副成吉思汗唐卡像，据说此像一打开，当天就要死人，必须用血祭礼，这一玄妙之物后来被八思巴封存，连同画套留在那里。”[21]这些记录与《史集》中的甘麻喇在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制成了已故祖先们的像”的记载不谋而合。正如额璘臣济农向五世达赖喇嘛陈述的那样，这幅神像或许是从蒙元时期遗留下来的圣物。总而言之，成吉思汗陵供奉的最高神为成吉思汗，而代表此神的圣物为成吉思汗神像。古代蒙古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教认为灵魂附着在某一物体上永存。作为成吉思汗亡灵的附体，成吉思汗神像一直是成吉思汗祭祀宫帐的主祭神象征物。至此我们认为，成吉思汗陵不是陵寝，而是成吉思汗灵宫。另外，成吉思汗八白室中确有“弓箭白室”、“大吉老白室（存放成吉思汗两套鞍辔）和“小吉老白室（存放孛儿帖的两套鞍辔）。这些遗物很可能早已遗失，留存至今的大概是复制品。这些遗物从八白室的建造之日起就是配享的附属品，不能因为有了它们而认定成吉思汗陵为衣冠冢。有关该箱子中藏有骨灰、肚脐、驼毛等说法，或依据传说，或故意渲染，缺乏事实依据。正如著名历史语言学家伯希和所言：“所有关于成吉思汗的陵墓在漠南，特别是在鄂尔多斯的传说，显然是后来编造的。这都是把陵墓本身同祭祀已故皇帝的宫帐混淆起来的结果，也是这些宫帐从漠北迁来河套的结果。”

概而言之，元代的成吉思汗四斡耳朵和明清两代的成吉思汗八白室，今日之成吉思汗陵性质相同，均属成吉思汗灵宫。绵延八百年的成吉思汗祭祀是灵魂祭祀，与中原汉地的帝王陵祭祀有着根本的区别。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成吉思汗祭祀是蒙元时期奠定的守宫制度的延续和传承。

参考文献

- [1] 宋濂. 元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 宋濂. 元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789.
- [3] 陈德芝. 蒙元史研究丛稿[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4] 宋濂. 元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693.
- [5]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 [6] 熊梦祥. 析津志·岁纪[Z].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 [7] 叶子奇. 草木子·杂制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8] 汉儒林等. 元朝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9] 宋濂. 元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912.
- [10] 韩雄亮, 郭彦龙, 张弓长. 成吉思汗陵墓在哪里. [EB/OL]. <http://www.peopie.com.cn>. 2004-11-19.
- [11] 白石典之. チンギス=ハン廟の源流[J]. 東洋學報, 2005, (4).
- [12] 拉施特. 史集(第二卷)[M]. 余大均, 周建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13] 宋濂. 元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50.
- [14] 王国维. 观堂集林 (卷 5)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15] 普兰·迦儿宾行记 鲁部鲁克东方行记 [M]. 余大均, 蔡志纯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9.
- [16] 理藩院则例 (第六册) [Z]. 尼日拉图, 金峰校注.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89.
- [17] 张穆. 蒙古游牧记 [M]. 张正明, 宋聚成点校.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 [18] 扎姆拉诺. 在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祭礼 [J]. 阿尔达扎布译. 蒙古语文, 1997, (2).
- [19] 成吉思汗八白室 [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8.
- [20] 扎姆拉诺. 在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祭礼 [J]. 阿尔达扎布译. 蒙古语文, 1997, (2): 5.
- [21] 阿旺洛桑. 五世达赖喇嘛传 (上册). 藏学出版社, 2006 年.

The Relation of Origin between Guarding Palace during the Period of Mongolian Yuan and Genghis Khan Mausoleum

By Qi Siqin

(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Inner Mongolia Huhhot 010010)

Abstract: Four Khan Ord was inherited by the queens successively after the death of Genghis Khan. Also Gamal and his descendants were made Kings of Jin by the imperial cour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Yuan Dynasty and guarded the area on the north of Mongolian desert. In addition, they were in charge of Four Khan Ord, namely, guarding palace in history. Previous research on this topic has been made from the angle of property inheritance instead of its purpose. After thumbing through Universal History and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Four Khan Ord was preserved in order to offer sacrifice, which is further proved by rec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the Four Khan Ord, Eight white house as well as Genghis Khan Mausoleum are all used as mausoleums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the regulations of guarding palace passed on from the Period of Mongolian Yuan.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Mongolian Yuan; guarding palace; relation of origin

收稿日期: 2013-11-15;

作者简介: 奇斯钦 (1955-), 男, 蒙古族, 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要研究领域有蒙古文字学、方言学和中期蒙古语。